

古史辨

第四冊

羅根澤 編著

海南出版社

古史辨

第四冊

諸子叢攷

羅根澤編著
容錦熙題

蹇 子 贊 翁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簫，梁邱據子家嚮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墾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顧 序

宇之廣，宙之久，材料是找不盡的，問題是提不完的。何況一種學問已有了二千餘年的積聚，現在剛把傳統的態度澈底改變，開手作全盤的清理之時，其困難煩亂之狀豈是想像得出的。我編印了三冊古史辨，每每有人問我，「古史辨出齊了嗎？」我祇得笑應之曰，「這書沒有出齊的日子，希望到我死後還有人繼續編下去呢。」因想起三年前在廣東時，有一位青年選修了我的課，耐不住了，焦躁地喊道，「我對於古史愈疑愈多，更碰更繁，越深入越不見底了！我看你找了無數材料，引了無數證據，預料定有斷然的結論在後頭，但末了仍是黑漆一團。如何你十年前的懷疑，到此刻仍未確定呢？我等待不及了！」他說的話是真心話，定然代表一部分人對我的感想。我慚愧我没有法子使他們滿意，因為我的工作本來不是一服急效的藥劑，供應不了他們的需要。

秦漢間的方士常說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對於古史，正有同樣的感覺。在許多條件沒有比較完備的時候，要找得一個系統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條件是什麼？許多現存材料，應當依着現在的歷史觀念和分類法去整理一過，此其一。許多缺着的材料要考古學家多多發見，由他們的手裏給與我們去補綴，此其二。以前學者提出的問題，哪些是已解決的，哪些是待解決的，哪些是不能解決的，應當審查一下，結一清賬，此其三。現在應當提出的新問題是什麼，這些新問題應當怎樣去謀解決，應當計畫一下，此其四。這舊材料和舊問題的整理已經够許多人的忙了，何況加以新材料和新問題的出現，更哪裏是少數人的力量所能包辦的！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舊的有了過半數的認識，對於新的有了大體的預測，纔可勉強搭起一座架子來，稱之為假設的系統。這件事，現在能做嗎？數年以來，一般人不耐沒有系統，但也不耐費了大功夫去搜集材料和推敲問題，於是祇在傳統的文獻裏兜圈子，真的不足，把偽的續，祇要給渺茫的古人穿上了一身自己想像中的衣服，就自以為找到新系統了。唉，除了自欺欺人之外，世界上還哪裏有這樣容易的事情！我儘可以給他們同情心，因為「慰情聊勝於無」是人類的通性。但我的治學的責任心不許我這樣幹，它祇願我一塊磚一塊瓦地造起屋子來，不願海市蜃樓在彈指之頃立現，也在彈指之頃消失。如果青年們因此而唾罵我為落伍者，那也祇得聽之。

可是系統和結論，我雖不急急地尋求，究竟它們也常在我的心底盤旋，醞釀

了好幾年了。今就作這序文的方便，略述所醞釀的如下：

我的研究古史的經歷甚簡單。幼年讀過幾部經書；那時適值思想解放的運動，使得我感到經書中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其後又值整理國故的運動，使得我感到這方面儘有工作可做。因為年輕喜事，所以一部分的材料尚未整理完工，而議論已先發表。遭逢時會，我所發表的議論想不到竟激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盜取了超過實際的稱譽。在友朋的督促之下，編印了古史辨第一冊。我向來對於學問的嗜好是很廣漠的，到這時，社會迫着我專向古史方面走去，我呢，因為已出了書，自己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所以也把它看作我的畢生工作的對象。

自從發表了幾篇古史論文之後，人家以為我是專研古史的，就有幾個大學邀我去任「中國上古史」的課；我惟有遜謝。這不是客氣，祇因擔任學校的功課必須具有系統的知識，而我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自問圖樣未打，模型未製，就造起渠渠的夏屋來，豈不危險。若說不妨遵用從前人的系統，那是違背了我的素志，更屬不可。可是受着生計的驅策，使我不得不向大學裏去討生活。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到的時候已開課了，功課表上已排上了我的「中國上古史」了，而且學生的選課也選定了。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這事怎麼辦呢？沒有辦法，祇得不編講義而專印材料，把許多零碎文字鈔集一編，約略組成一個系統。那時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種：

甲種——上古史的舊系統（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為代表。）

乙種——甲種的比較材料

（一，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的材料；

二，其他真實的古史材料。現在看來，這兩類不應合在一起。）

丙種——（一）虛偽的古史材料；

（二）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

丁種——古史材料的評論。

戊種——預備建立上古史的新系統的研究文字。

那時搜集到的材料約有二百萬言，在一個學校的功課裡已不能算少，但自問把這些材料系統化的能力還差得遠；且範圍太大，一個人也不能同時注意到許多方面。因此，我覺得有分類編輯古史材料集的需要。但這是一個學術團體的事，或是一個人的長期工作，決不是教書辦事終日亂忙的我所能擔負的。

爲了北平的環境適宜於研究，所以十八年就回到這舊游之地來，進了燕京大學。來的時候，「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課目也早公佈了。幸而我有了兩年來的預備，不致像那時般發慌。但年前編的是些零碎材料，沒有貫穿的，現在則不該如此了。計畫的結果，擬就舊稿改為較有系統的敘述，凡分三編：

甲編 舊系統的古史。

乙編 新舊史料的評論。

丙編 新系統的古史。

可是不幸得很，編了一年，甲編尚未編完，更說不到乙丙兩編。所以然者何？祇因舊系統方面，我想編四個考：

（一）辨古代帝王的系統及年歷，事蹟，稱之爲帝繫考。

（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來與其異同，稱之爲王制考。

（三）辨帝王的心傳及聖賢的學派，稱之爲道統考。

（四）辨經書的構成及經學的演變，稱之爲經學考。

這四種，我深信爲舊系統下的偽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們所要破壞的偽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壽命。我很想作成之後合爲古史考，與載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輔而行。可是一件事情，計畫容易，實做甚難。帝繫，道統兩考比較遠簡單；而王制和經學的內涵則複雜萬狀，非隱居十載簡直無從下手。因此，在燕大所編的上古史講義祇成了帝繫考的一部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卷一期）即是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此後爲了預備作王制考，改開了尚書研究一課，一篇篇地教讀，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別方面的材料。工作的情况，誠有如某君所云，「愈疑愈多，更碰更繁，越深入越不見底。」不過，我不像他那樣急性，決不以「黑漆一團」而灰心。我總希望以長時間的努力，得到一部分的「斷然的結論」，來告無罪於讀者。

這一個計畫，蓄在我的心頭已三年多了。我自信這是力之所及，祇要肯忍耐便有成就之望的。所以沒有發表之故，祇因怕惹起了急性的讀者們的盼望和責備。現在強鄰逞暴，國土日蹙，我們正如釜中之魚，生死懸於人手，不知更能讀幾天書，再得研究幾個題目。就算苟全了性命，也不知道時勢逼着我跑到什麼地方，熱情逼着我改變了什麼職業。如果不幸而被犧牲了，那在民族與國家的大損失中也算不了一回事。但中國不亡，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國的同志起而繼續之的，我很願他參考我的計畫。所以現在略略寫出我對於這四種的意見：

我們的古史裏藏着許多偶像，而帝繫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所謂華夏民族究竟從哪裡來，它和許多鄰境的小民族有無統屬的關係，此問題須待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努力，非現有的材料所可討論。但我們從古書裏看，在周代時原是各個民族各有其始祖，而與他族不相統屬。如詩經中記載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鳥」降下來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來的，都以爲自己的民族出於上帝。這固然不可信，但當時商周兩族自己不以爲同出於一系，則是一個極清楚的事實。左傳上說，「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則太皞與有濟是任宿諸國的祖先。又說，「陳，顓頊之族也」，則顓頊是陳國的祖先。至於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傳上說鯀爲夏郊。又如史記封禪書上說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這原是各說各的，不是一條綫上

的人物。到了戰國時，許多小國併吞的結果，成了幾個極大的國；後來秦始皇又成了統一的事業。但各民族間的種族觀念是向來極深的，祇有黃河下流的民族喚做華夏，其餘的都喚做蠻夷。疆域的統一雖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間的惡感，使其能安居於一國之中，則武力便無所施其技。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把祖先和神靈的「橫的系統」改成了「縱的系統」，把甲國的祖算做了乙國的祖的父親，又把丙國的神算做了甲國的祖的父親。他們起來喊道，「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分散得遠了，所以情誼疏了，風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為一國，咱們應當化除畛域的成見！」這是謊話，卻很可以匡濟時艱，使各民族間發生了同氣連枝的信仰。本來楚國人的馭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聽的，到這時知道楚國是帝高陽的後人，而帝高陽是黃帝的孫兒了。本來越國人的文身雕題，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這時知道越國是禹的後人，而禹是黃帝的玄孫了。（國語中記史伯之言，越本半姓；但到這時，也祇得隨了禹而改為姒姓了。）最顧著的，當時所謂華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嚳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嚳次妃之子，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可見華夏的商周和蠻夷的楚越本屬一家。借了這種帝王系統的謊話來收拾人心，號召統一，確是一種極有力的政治作用。但這種說法傳到了後世，便成了歷史上不易消釋的「三皇五帝」的癥瘕，永遠做真史實的障礙。（如有人說：中國人求團結還來不及，怎可使其分散。照你所說，漢族本非一家，豈不是又成了分離之兆。我將答說：這不須過慮。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開，即五胡，遼，金諸族也無法在漢族裡分析出去了。要使中國人民團結，還是舉出過去的同化事實，積極移民邊陲，鼓勵其雜居與合作。至於歷史上的真相，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除了種族的混合之外，陰陽五行的信仰也是構成帝繫說的一個重大原因。

王制為政治的偶像，亦始創于戰國而大行于漢。古代對於先朝文獻本不注意保存，執政者又因其不便于自己的行事，加以毀壞。所以孔子欲觀夏殷之禮，而杞宋已不足徵；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事，而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戰國的諸子同抱救世之心，對於時王之制常思斟酌損益；而儒家好言禮，所改造的制度尤多。又慮其說之創而不見信，則託為古代所已有。淮南子修務訓所謂「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真是說盡了這班造偽和信偽的人的心理。所以三年之喪廁之于堯典，五等之爵著之於春秋，而人遂無有疑者。同時出了一個鄒衍，他杜撰五德終始說，以為「五德轉移，治各有宜」，政治制度應由五德而排成五種。他們說，黃帝為土德，夏為木德，商為金德，周為火德，秦為水德，漢又為土德；這各代的制度遂各不相同，惟漢與黃帝以同德而相同。稍後又出了一種三統說，截取了五德說的五分之三而亦循環之，於是政治制度又分為三種。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繼周者（春秋與漢）又為黑統。有了這樣的編排，而古

代制度不必到古國去尋，也不必向古籍裏找，祇須畫一五德三統的表格，便自會循次地出現。例如禮記檀弓中說，「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黑馬），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白馬），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赤馬），牲用騂」。懂得了三統說的方式，就知道這一個禮制單是這樣地推出來的。如月令十二紀，則是五德說支配下的禮制。其中所謂五時，五方，五帝，五神，五祀，五蟲，五畜，五數，五音，五色，五味，五臭，……莫不是從五行上推出來的。人事哪能這樣整齊，又哪能這樣單調！董仲舒所作的三代改制質文篇寫的推求的方式尤為顯明。照他所說，自神農至春秋十代的禮制俱可一目了然，不但如此，推上推下可至無窮，真是「雖百世可知也！」照他所說，古代帝王儘不必有遺文留與後人，祇要把他們的代次傳了下來，即可顯示其一切。以我們今日的理智，來看他們的古史，不禁咋舌。但是都假了嗎？那也不然，他們總有一些兒的依傍。如上所舉，周人尚赤，牲用騂，乃由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及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來。是則檀弓所言，別的均假，惟此不假。推想其它單子，亦當如此。即如明堂，月令中說得轟轟烈烈的當然是假，後儒把許多不相干的什麼文祖，太廟，衢室，總街……都說成明堂也當然是附會，但孟子裏的齊宣王欲毀明堂一事則不假。究竟三禮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這是一件極難斷定的事情。這種的分析，將來必須有人費了大功夫去做。其術，應當從甲骨文中歸納出真商禮，從金文，詩，書，春秋，左傳，國語中歸納出真周禮，史記，漢書中歸納出漢禮，而更以之與儒家及諸子所傳的禮書禮說相比較，庶幾可得有比較近真的結論。

道統是倫理的偶像。有了道統說，使得最有名的古人都成了一個模型裏製出來的人物；而且成為一個集團，彼此有互相維護的局勢。他們以為「天不變，道亦不變」，凡是聖人都得到這不變之道的全體。聖與聖之間，或直接傳授，或久絕之餘，以天直聰明而紹其傳。最早的道統說，似乎是論語的末篇，「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見得堯傳舜，舜傳禹，聖聖傳心，都在「執中」一言。下面記湯告天之詞，記武王大賚之事，見得湯與武王雖不能親接堯舜禹，而心事則同，足以繼其道統。但論語末數篇本有問題，此所謂「天之歷數」頗有五德轉移的意味，「允執其中」亦是儒家中庸之義，疑出後儒臆入，非論語本有。推測原始，當在孟子。盡心篇的末章說，堯舜後五百餘歲，湯聞而知之；湯後五百餘歲，文王聞而知之；文王後五百餘歲，孔子聞而知之：見得孔子的道即是堯舜的道，相去千五百餘年沒有變過。孔子以後，他以為沒有聞道的了，所以以一歎結之。然孟子常說「私淑諸人」，「乃所願則學孔子」，可見他是聞孔子之道的，也就是直接堯舜之傳的。他說這番話，不過為自己占地位。後人讀到這一章，輒不自期地發生思古之幽情，有志遠紹聖緒。如司馬遷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

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自序）這就可見孟子的話發生了有力的影響。其後揚雄，王通，韓愈等各欲負荷這道統，不幸沒有得到世人的公認。到宋代理學興起，要想把自己一派直接孟子，以徒黨鼓吹之盛，竟得成功，而濂洛關閩諸家就成了儒教的正統，至今一個個牌位配享在孔廟。這個統，自堯舜至禹湯，至文武周公，至孔孟，又至周程們，把古代與近代緊緊聯起。究竟堯舜的道是什麼？翻開經書和子書，面目各各不同，教我們如何去確定它？再說，孔孟之道是相同嗎？何以孔子稱美管晏而孟子羞道之；何以孔子崇霸業而孟子崇王道？即此可見孔孟之間相去雖僅百餘年，而社會背景已絕異，其道已不能不變，何況隔了數千百年的。至於宋之周程們，其道何嘗得之於孔孟。周敦頤的學問受於陳搏，他是一個華山道士。太極圖是他們的哲學基礎，而這圖乃是從仙人魏伯陽的參同契裏脫化出來的。所以要是尋理學的前緒，這條綫也不能挂在孔孟的脚下。他們又從偽大禹謨中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算做堯舜以來聖人相傳的心法；但這是從荀子所引的道經加上堯曰雜湊起來的，道經是道家的東西，依然不是堯舜之言，儒家之語。至於堯舜以前，他們又要推上去，於是取材于易繫辭傳的觀象制器之章，而加上伏羲，神農，黃帝。祇是這章文字非用互體說和卦變說不能解釋，而這兩種學說乃西漢的易家所創造，不是真的古代記載。道統說的材料如此的一無可取，然而道統說的影響竟使後人感到古聖賢有一貫的思想，永遠不變的學說，密密地維護，高高地鎮壓，既不許疑，亦不敢疑，成為各種革新的阻礙，這真是始作俑的孟子所想不到的成功。

經學是學術的偶像。本來古代的知識為貴族所獨占，智識分子祇是貴族的寄生者。貴族有樂官，他們收聚了許多樂歌，所以有詩經。貴族有史官，他們記載了許多事件，所以有尚書和春秋。貴族有卜官，他們管着許多卜筮的繇辭，所以有周易。貴族有禮官，他們保存許多禮節單，所以有儀禮。實在說來，幾部真的經書都是國君及卿大夫士們的日常應用的東西，意義簡單，有何神秘。詩，書，禮，樂，是各國都有的。易和春秋，是魯國特有的。（左傳上記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這句話大概可信。孟子上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見同樣的紀載春秋時代的史書，在晉的叫做乘，在楚的叫做檮杌，在魯的叫做春秋。）孔子生在魯國，收了許多弟子，把魯國所有的書籍當作教科書，這原是平常的事。他死了之後，弟子們造成一個極大的學派，很占勢力，就把魯國的書加以潤飾（如儀禮的喪服，春秋的名號和褒貶諸端），算作本學派的經典，這也是平常的事。戰國時，平民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吸收智識，而當時實無多書可讀，祇有讀儒家的經。孔子之所以特別偉大，六經之所以有廣遠的流傳，其原因恐即在此。到了漢代，孔子定為一尊，大家替他裝點，于是更添出了許多微言大義。他們把不完全的經算是孔子所刪，把完全的算做孔子所作。

於是經書遂與孔子發生了不可分解的關係，幾乎每一個字裏都透進了他的深意。這還不管；尊孔之極，把經師們所作的筆記雜說也算做經，把儒家的學說也算做經，把新出現的偽書也算做經，而有『十三經』的組織。十三經，何嘗連貫得起，祇是從西周之初至西漢之末一千一百年中慢慢地疊起來的。（若加偽古文尚書則歷一千三百余年。）一般人不知道，以為十三經便是孔子，也便是道德，祇要提倡讀經，國民的道德就會提高，這真是白日做夢。講起一班西漢的經師，會占卦，會求雨，開口是禎祥，閉口是災異，結果造成了許多讖緯，把平凡的人物都講成了不平凡的妖怪。東漢的經師講訓詁，當然好得多，可是穿鑿附會的工夫也到了絕頂。例如鄭玄，他是一個極博的學者，卻有一個毛病，最喜歡把不一致的材料講成一致。這類的事極多，試舉其一。禮記王制說，「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一種封國說。周官職方氏則謂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又是一種封國說。這兩種說廣狹懸殊（前說的公國祇一萬方裏，後說的便有二十五萬方里），決合不在一起。但他想，周官出於周公已無疑，王制雖未標明時代，既在禮記中則亦必出周人，於是為調和之說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指王制），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指周官），制禮成武王之意」。（王制注）照他所說，是武王時的疆域計廣九百萬方里（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周公時的疆域則廣一萬萬方里（職方氏，王畿方千里，外九服各方五百里）。何以周公時的國土會大于武王時十一倍餘？要是作史的人照他所說的寫在書上，豈不成了周初歷史的一件奇蹟。然而學者相傳，「寧道周孔誤，諱言服鄭非」，鄭玄在經學上的威權直維持到清末。所以經學裏面不知道包含了多少違背人性和事實的說話，祇是大家不敢去疑它。既不能把它推翻，而為了敘述歷史的需要去使用它時又祇能從這裏面去抽取材料，這幾何而不上他們的當。所以為要瞭解經書的真相和經師的功罪，使古史不絀絆於經學，我們就不得不起來作嚴正的批評，推倒這個偶像。

這四種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論上。本來語言風俗不同，祖先氏姓有別的民族，歸于黃帝的一元論。本來隨時改易的禮制，歸于五德或三統的一元論。本來救世蔽，應世變的紛紛之說，歸于堯舜傳心的一元論。本來性質思想不一致的典籍，歸于孔子編撰的一元論。這四種一元論又歸於一，就是拿道統說來統一切，使古代的帝王莫不傳此道統，古代的禮制莫非古帝王的道的表現，而孔子的經更是這個道的記載。有了這樣堅實的一元論，於是我們的歷史一切被其攪亂，我們的思想一切受其統治。無論哪個有本領的人，總被這一朵黑雲遮住了頭頂，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跳出這個自古相傳的道。你若打破它的一點，就牽及於全體，而衛道的大反動也就跟着起來。既打不破，惟有順從了它。古代不必說；就是革命潮流高漲的今日，試看所謂革命的中心人物還想上紹堯舜孔子的道統而建立其哲學基礎，就知道這勢力是怎樣的頑強呢。然而，我們的民族所以墮在沈沈

的暮氣之中，喪失了創造力和自信力，不能反應刺戟，抵抗強權，我敢說，這種思想的毒害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家以為蓄大德，成大功的是聖人，而自己感到渺小，以為不足以預於此，就甘心把能力暴棄了。大家以為黃金時代在古人之世，就覺得前途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下半世的太衰頹，正由於上半世的太繁盛。要是這繁盛是真的，其消極還值得，無奈祇是些想像呵！所以我們無論為求真的學術計，或為求生存的民族計，既已發見了這些主題，就當拆去其偽造的體系和裝點的形態而回復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曉然于古代真像不過如此，民族的光榮不在過去而在將來。我們要使古人祇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要使古史祇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倫理教條；要使古書祇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這固是一個大破壞，但非有此破壞，我們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條生路。我們的破壞，並不是一種殘酷的行爲，祇是使它們各各回復其歷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復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總之，送它們到博物院去。至於古人的道德，學術，制度，可保存於今日的，當然應該依了現代的需要而保存之，或加以斟酌損益，這正如博物院中的東西未嘗不可供給現代人的使用。但這是另一事，應由另一批人去幹；我們的工作祇是博物院中的分類陳列的工作而已。

我自己的工作雖偏于破壞偽史方面，但我知道古史範圍之大，決不能以我所治的賅括全部，我必當和他人分工合作。數年以來，我常想把古史辨的編輯公開，由各方面的專家輯錄天文，歷法，地理，民族，社會史，考古學……諸論文為專集。就是破壞偽史方面，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逐部的經書和子書，都得有人專治並注意到歷來的討論。能彀這樣，我便可不作『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祇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員。我的能力之小，正無礙于學問的領域之大。能彀這樣，古史的研究自然日趨于系統化，人們的責望也自然會得對於古史學界而發，不對於某一個人而發。一般人如能有此分工合作的正確的學問觀念，學者們始可安心地從事其專門的工作而得到其應有的收穫，不給非分的責望所壓死，也不至發生『惟我獨尊』的驕心了。

羅雨亭先生（根澤）是努力研究諸子學的一人。他著有管子探源，孟子評傳諸書，對於墨子，老子，莊子，荀子，戰國策，尹文子，鄧析子，燕丹子，慎子，孔叢子，新書，新語，新序，說苑等書又都有考證。去年一月，他把編輯的諸子叢考給我看：起自唐代，訖于今日，凡辨論諸子書的年代和真偽的文字都蒐羅於一集，計二百餘篇。把異時異地的考辨，甚至站在兩極端的主張，放在一起，讀者們比較之下，當然容易獲得客觀的真實，於以解決舊問題，發生新問題。我見了，觸動了我的宿願，就請求他編列為古史辨的第四冊。承他的厚意，給我以如願的答覆。惟篇幅太多，非一冊所可容納；於是先把清以上的文字刪掉，繼把名

家和陰陽家等問題留下。然而僅僅這儒墨道法四家，十餘年來討論的文字已着實可觀。這些文字散在各處，大家乍爾一想，似乎沒有多少，問題也沒有幾個。現在集合了起來，馬上見得近年的文籍考訂學是怎樣的進步了。這可欣幸的進步，其由來有二：第一，學問上的束縛解除了，大家可以作自由的批判，精神既活潑，成績自豐富。第二，文籍考訂學的方法，大家已得到了；方法既差不多趨於一致，而觀點頗有不同，因此易起辨論。「知出於爭」，愈辨論則其真相亦遂愈明白。雖是有許多問題不能遽得結論，但在這條長途上，祇要征人們肯告奮勇，不開倒車，必然可以達到目的地。所不幸的者，時勢的紛擾，生計的壓迫，使人不能不分心，有的竟至退了下來。如果我們的祖國在受盡磨難之後，一旦得到了新生命，這種研究一定比現在更興盛，因為這一重久閉的門已經打開了，可工作的題目早放在人們的眼前了，許多發展的條件是具備了。

中國的古籍，經和子占兩大部分。普泛的說來，經是官書，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說，經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但這幾句話，在戰國以前說則可，在漢以下說則必不可。經書本不限于儒家所誦習，但現在傳下來的經書確已經過了戰國和漢的儒家的修改了；倘使不把他們所增加的刪去，又不把他們所刪去的尋出一個大概，我們便不能逕視為官書和古代的政治史料，我們祇能認為儒家的經典。因此，經竟變成了子的附庸；如不明白諸子的背景及其成就，即無以明白儒家的地位，也就不能化驗這幾部經書的成分，測量這幾部經書的全體。因此，研究中國的古學和古籍，不得不從諸子入手，俾在諸子方面得到了真確的觀念之後再去治經。子書地位的重要，於此可見。

不幸自漢武帝尊儒學而黜百家之後，子的地位驟形低落。儒家的幾部子書，升做經了。賸下來的，以儒者的蔑視和功令的棄置，便沒有人去讀；偶有去讀的也不過爲了文章的欣賞。子書的若存若亡，凡歷二千年。猶幸重要的幾種尚未傳。到了清代，因為研究經學須賴他種古籍作輔佐，而子書爲其大宗，故有畢沅，謝墉，孫星衍，盧文弨等的校刻，嚴可均，汪繼培，馬國翰等的輯錄，汪中，王念孫，俞樾，孫詒讓等的研究，而沈霾已久的東西復顯現其光輝。到清末，康有爲作孔子改制考，以爲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託古改制，爭教互攻。孔子亦諸子之一，創儒教，作六經，託之于堯舜文王。以其託古而非真古，故弟子時人常據舊制相問難。他的話，現在由我們看來，也不能完全同意。因為儒教的創造，六經的編集，託古的盛行，都是孔子以後的事。孔子當年對於自己的工作並沒有很大的計劃，祇是隨着弟子們的性格指導以人生的任務。又六經中的思想制度，錯雜而不單純，必不能定爲一時一人所作。但儒教發源於孔子，六經中的堯舜文王有若干出於儒教所贗託，這是無疑的。明白了這一點，則周末諸子并起創教，託古改制，儒家的宗旨與諸家異，儒家的方式與諸家同：康氏所發見的事實確已捉得了子學和經學的中心。祇因他的見解是超時代的，故孔子改制考出版之後，發生不出什

麼影響。我自己，雖在不忍雜誌裡見到改制考的目錄，惟以沒見全文（未登完），也不甚注意。

自從劉歆在七略中規定了諸子有九家，每家都出於一個官守，學者信爲真事，頻加援引。鄭樵的校讎略，章學誠的校讎通義，尤爲宣傳的中堅。諸子既是同出王官，原在一個系統之下，如何會得互相攻擊？儒墨固常見于戰國書中，何以其它的家派之名竟無所見，而始見於漢代，甚至到了七略纔露臉？這些問題，不知從前人爲什麼提不出來。民國六年四月，適之先生在國外作了一篇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就是這年的秋天，他到北京大學授課，在課堂上亦曾提起此文；但送去印了，我們都未得見。延至年底，太平洋雜誌把它登出，有幾位同學相約到圖書館鈔寫，我始得一讀。我那幾年中頗喜治子，但別人和自己的解說總覺得有些不對，雖則說不出所以然來。自讀此篇，髣髴把我的頭腦洗刷了一下，使我認到了一條光明之路。從此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於王官，而承認諸子的興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說在各求其所需要。諸子的先天的關聯既失了存在，後天的攻擊又出于其立場的不同，以前所不得消釋的糾纏和牴牾都消釋了。再與孔子改制考合讀，整部的諸子的歷史似乎已被我鳥瞰過了。可是這種不自然的關係，家派方面雖已解除，而個人方面尚有存在，例如道家的老子爲儒家的孔子之師的故事。到民國十一年春天，梁任公先生發表其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的意見，始把我的頭腦又洗了一下。凡古人所噴着的厚霧，所建着的障壁，得此兩回提示，覺得漸有肅清的 ممکن了。這真是學術史上應當紀念的大事！現在羅先生把這兩篇文字放在本冊兩編的開頭，使我回憶前事，生出無限的歡喜。我敢說，一個人發見的真理是大家可以承認的，一個人感受的影響也是大家直接間接，有意無意間所受到的；本冊中容納的四十餘萬言的討論恐怕大部分都是從這兩篇引起。如果没有這兩篇，時代的颶風固然也終於吹散這堆浮雲，但總要慢一些了，民國二十一年的羅先生是編不出這一冊的。等到這一冊書出來之後，研究諸子學的風氣又推進一層了，將來他再編第二，第三冊諸子叢考時，當然討論得更深密了。子書方面，既無西周文字，不如經書的考訂之勞，又不曾經過經學家的穿鑿附會，不必多費刪芟葛藤的功夫，其得到結論必較經學爲速。羅先生研究諸子早定有詳細的計畫，我敢鼓舞贊歎以豫祝他的將來的成功！

有一點意思，我和羅先生略有出入。『考年代與辨真偽不同：辨真偽，追求偽蹟，擯斥不使廁于學術界，義主破壞；考年代，稽考作書時期，以還學術史上之時代價值，義主建設』（本書頁四〇九），這個意見，他屢屢提起。由我看來，這二事實沒有嚴密的界限。所謂考年代，也就是辨去其偽託之時代而置之於其真時代中。考年代是目的，辨真偽是手段。所以我們的辨偽，決不是秦始皇的焚書。不過一般人確實常有焚書的誤認，所以常聽得人說，『顧頡剛們說這部書偽，那部書

偽；照這說法，不知再有什麼書可讀！」這真是太不瞭解我們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我們闢周官偽，祇是闢去周官與周公的關係，要使後人不再沿傳統之說而云周公作周官。至於這部書的價值，我們終究承認的。要是戰國時人作的，它是戰國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漢時人作的，它便是西漢政治思想史的材料。又如我們闢左傳偽，也祇要闢去左傳與孔子的關係，使後人不再說「左丘明與孔子俱乘傳如周，觀百二十國寶書」，以及「孔子作春秋，丘明爲之傳」等話。至於它的歷史價值，文學價值，我們何嘗不承認。堪笑一般人以爲我們用了劉逢祿康有爲的話而辨左傳，就稱我們爲今文學家。不知我們對於春秋時的歷史，信左傳的程度乃遠過于信公羊傳。我們所擯斥的，不過「君子曰」及許多勉強塗附上去的釋經之語，媚劉氏之語，證世經之語而已。而且所謂擯斥云者，祇擯斥之於原本的左傳（國語），並不擯斥之於改本的左傳（西漢末以來的流傳本）。這原是以漢還漢，以周還周的辦法，有何不可。我們所以有破壞，正因求建設。破壞與建設，祇是一事的兩面，不是根本的歧異。

況且辨偽這件事，原不是我們幾個人忽發奇想想出來的，也不是我們的態度激烈，有意打倒前人而鼓吹起來的。當「文武之道未墜」的春秋之世，子貢已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口邊常提「詩云」「書曰」的孟子，也會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凡是理智發達的人，決不會對於任何事物無條件的信仰。班固著漢書藝文志，根據的是劉向歆父子的七略，其所錄書名之下輒注云「依託」，「非古語」，「近世增加」。有的更直揭其作時與作者，如神農二十篇，不但不信爲神農之書，且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又如黃帝泰素，不但不信爲黃帝之書，且注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以漢人歷史觀念的薄弱，劉歆又蒙有造偽書的絕大嫌疑，而其所作序錄尚如此，可見是非之公自有不容泯滅者在。到東漢，有王充的「疾虛妄」的論衡，打破了無數不合理性的傳說，其藝增儒增等篇對於經書和子書舉發了不少的疑點。到唐，有劉知幾的史通，對於古代的史料與史法作不容情的批判。他不信古代記載爲完全的真實；他還說破學術界所以不敢疑古的心理，是「拘于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疑古）這句話真痛快，真確切。學術界的所以平靜，並不是古無可疑，也不是智不能疑，而祇是受了禮法和師訓的束縛，失去了言論的自由。換句話說，學者們對於古事，但有腹誹而已，哪敢說在嘴上，寫在紙上。這正如專制的家庭，尊長對於卑幼凌虐萬狀，卑幼祇有將痛苦咽在肚裏，面子上依然是叩頭服從。家庭如此，當然非健全的家庭。學術界如此，也當然非健全的學術界。

唐代以上，因爲書卷都由鈔寫，一個人不能得到很多的書，不易做比較考訂的工作，所以辨偽的事祇限于幾個特出的人。自從有了刻版，書價低廉，學者能見的書驟然增加了許多，而辨偽遂成爲一時普遍的風氣。我們翻開宋代人的文集和筆記，幾乎可疑的古書已全被檢舉。例如古史辨第三冊裏，我懷疑易傳中的觀

象制器的故事，似乎在今日猶爲新奇之說，但葉適的習學記言裏已早說道，『十三卦亦近世學者所標指，而其說尤爲不通。包犧氏始爲罔罟，神農氏始爲耒耨，交易，黃帝堯舜始爲衣裳，其後乃有舟楫，馬牛，臼杵，弧矢，宮室，棟宇。甚矣其不考于易也！易十三卦義詳矣，乃無毫釐形似之相近者』。（卷四）又如孝經，是一部含有濃厚的宗教性的經典，誰敢疑它，卻不道在道統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朱熹反一再說它除了開頭一段之外不是聖人之言，其文遠不如論語中說孝的親切有味，而且勦襲左傳，文勢反不通貫。（見孝經刊誤及語類）古文尚書中，聖帝和賢臣所說的話何等光明正大，勤政愛民，真是最好的道德教條；但自吳棫發難，朱熹繼之，疑者接踵，直到閻若璩而判決爲偽造，這個案子再也翻不過來。他們何嘗是輕蔑古代，侮聖人之言，祇爲用了求真理的態度來治學問，不得不如此。

現存的古書莫非漢人所編定，現存的古事莫不經漢人的排比，而漢代是一個「通經致用」的時代，爲謀他們應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犧牲古書古事來遷就他們自己，所以漢學是攪亂史蹟的大本營。同時，漢代是迷信陰陽五行學說的時代，什麼事都要受這學說的支配，所以不少的古代史蹟已被迫領受了這個洗禮。其後隋代禁讖緯，宋代作新注，漢學早已銷沈。不料清代學者信而好古，他們在「漢人近古，其說必有所據」的前提之下工作，於是漢學復興而疑古之風爲之減殺，宋人精神幾于斷絕。可是，他們除了漢人之說不敢獻疑之外，對於魏晉之說畢竟也做了許多有力量的辨偽工作。例如古文尚書孔傳，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都因代鄭玄反王肅的緣故而明白宣布其偽造的證據。其後今文家起，對於古文家的幾部經傳，書序，毛詩，周官，左傳等，又肆抨擊。史書方面，考訂譌誤的極多，廣雅書局已集爲叢書，其中梁玉繩的史記志疑，直把漢武帝以前的史蹟作一總清理，其氣魄尤爲偉大。可見辨偽之事既已開了頭，便遏束不來。好象長江大河挾了百川東流，勢極洶湧，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

我們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導它的下流，使之歸於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這個工作是遲早必做的，而我們在這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讀古書，更是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可憐一般人沒有溯源尋流，不知道這是一件必然的事，竟看我們是『異軍蒼頭特起』！又或看見我們表章鄭樵，姚際恒，崔述，康有爲們，而這一般人有些短處和漏洞落在人手，即以爲是辨偽工作本身的危險。又或因我們提倡辨偽已有十餘年了，看得厭了，便以爲不必再走這老路。這都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我們爲他們悲傷，不如爲中國的學術界悲傷。中國的學術界做深澈的工作的太少了，大家祇見當前的時髦貨色，而這些貨色是過數年必須換一次的，大家看慣了，以爲我們研究古史，提倡辨偽，亦是時髦的一種，有改換的必要。不知道我們的工作有源有委，既不隨便而來，也不隨便而去。別人的短處，我們可以修改。旁觀者的厭倦，並不會影響到我們而亦厭倦。謝謝批評的人們：願你們在了解我們的態度和我們的工作的由來之後再發言罷！

又近年唯物史觀風靡一世，就有許多人痛詆我們不站在這個立場上作研究爲不當。他人我不知；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蹟，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無寧說這種種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證學者的借助之爲宜；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爲其基本觀念。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在分工的原則之下，許多學問各有其領域，亦各當以其所得相輔助，不必「東風壓倒西風」纔算快意。況且我們現在考辨古書，爲什麼成績能比宋人好，祇因清代三百年的學者已把古書整理得很清楚了，我們要用好版本，有；要用好注釋，也有；要尋零碎的考證文字，也多得很。清代的學者辛辛苦苦，積聚了許多材料，聽我們用。我們取精用弘，費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然而清代學者大都是信古的，他們哪裏想得到傳到現在，會給我們取作疑古之用！所以然者，他們自居於「下學」，把這根柢打好了，我們就可跳一級而得其「上達」了。他們的校勘訓詁是第一級，我們的考證事實是第二級。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偽弄清楚，這一層的根本又打好了，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得錯用了。是則我們的「下學」適以利唯物史觀者的「上達」；我們雖不談史觀，何嘗阻礙了他們的進行，我們正爲他們準備着初步工作的堅實基礎呢！若說我們的工作做得太慢，得到結論不知在何年，他們等不及了，可是不幸得很，任何學問都是性急不來的。我們考辨古書，須借助于語言學家，考古學家之處不知有多少；而語言學家等又各有須待借助的他種學問，不能在我們一發問之後即致一個滿意的回答。我們若因他們的不能回答或回答而不能使我們滿意之故，就喊出打倒他們的口號，不與他們合作，那麼無非得到同歸於盡的結果，有什麼益處？所以，須待借助於我們的還請鎮靜地等待下去罷！如果等待不及，請你們自己起來幹罷！如果幹得不耐煩，也希望不要因材料的缺乏和填表格的需要，便把戰國秦漢間人用了他們的方式製造出來的上古史使用於真的上古：因爲將來一定可以證明，這種工夫是白費的！

正經的話說得太多了，板着面孔沒有趣，我們還是同唱一首陝西的歌謠，大家樂一樂罷：

姐姐縫衣縫窟窿，
哥哥看書看不通；
兩人急的滿石碰，
幾乎成了瘋先生。
『不要急來不要慌！
慢慢看來慢慢縫，
就是功到自然成。
那有一撇挖成井；